

# 支持我国 21 世纪初 经济高速稳定增长的体制创新研究

周小亮

## 一、引言

自 1993 年以来,我国经济已出现连续 7 年的缓慢下滑。尽管如此,1999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仍然实现了 7.1% 的高增长。就目前来说,我国经济尽管是处于过剩运行状态,但仍然是处在“次高”增长阶段。由于我国近几年连续采取了宽松的积极宏观经济政策,这一方面削弱、遏制了我国目前经济下滑的势头,另一方面由于政策的“时滞”效应,还会对我国今后的快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效果。如果再考虑到 21 世纪初实现相对充分就业的压力与实现邓小平同志的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江泽民同志所强调的全面落实跨世纪发展宏伟任务的客观需要,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在 21 世纪初我国经济将会再次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预测和判断:“十五”(2001—2005 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将为 7.5% 左右,2006—2015 年期间,经济增长争取实现 7%。2000 年我国第一季度 GDP 增长已达 8.1% 之高,这是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再次进入“快速增长”的良好先兆。

如果我们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则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制约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诚然扩大需求,实现消费与生产的良性循环对于经济快速增长是很重要的,但问题的主要方面是如何努力改善供给。供给改善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要素效率的全面提高,而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其关键在于如何加快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因为,从供给角度看,目前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主要有三大“瓶颈”,即技术创新的外生性和创新能力不足、人力资源素质偏低以及城市化及与工业化发展脱节。这三大瓶颈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体制瓶颈”与“科技瓶颈”。就我国情况看,体制瓶颈是主要方面,因为体制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只有进行体制创新,建立有绩效的经济体制,才能激发经济主体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由此看来,制约我国 21 世纪初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因素是来自体制瓶颈的障碍,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创新。为此,本文以经济增长源泉理论分析的演进与制度绩效生命周期和递减规律为理论基础,说明要确保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必须进行新一轮体制创新,并在概括我国 20 世纪末进行的体制创新的特征基础上,提出了 21 世纪中国体制创新的基础原则和相应的政策选择。

## 二、经济增长源泉理论分析的演进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最终动力的理论分析,伴随着经济

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而演进与变革。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他们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突出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讲,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一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以凯恩斯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并标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起点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强调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和资本两个内生变量与技术外生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特别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他们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分析的理论结论是:经济长期增长是经济体系中内生变量如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作用的结果,在外生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下,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进入了“后工业时代”,知识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或者说“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在“新经济”实践基础上,罗默等一批经济学家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并认为内生的知识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增长理论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起初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说明经济增长的决定。这里主要有两条研究思路。其一是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主流研究思路,主要反映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斯托齐的边干边学模型等模型中。该类增长模型认为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存在重要的宏观溢出效应,技术溢出的存在使经济呈现规模收益递增,从而推动经济实现持续的内生增长。其二是以琼思、雷贝洛为代表提出的研究思路。在他们提出的增长模型中,强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在垄断竞争假设下说明经济增长的各种类型与决定因素。这里,主要有三类增长模型。其一是罗默、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等人提出的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产品的不断增加,并认为生产知识的研究开发部门是新经济的核心部门,内生的知识积累可以增加社会生产成本,促使经济出现规模收益递增运行,从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其二是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塞格斯特

罗姆、阿格亨和豪伊特等人提出的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各类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是由于新一代产品的出现导致生产成本降低、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持续增长。其三是贝克尔和墨菲、杨小凯和博兰德等人提出的专业化加深型增长模型。该类模型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分工的不断深化。

以上各种新经济增长模型一方面从时代特征与现代生产力发展角度探讨了新经济增长的源泉,为知识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作为在某种意义上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制度被视为既定的外生变量,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制度约束分析以及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分析,因此,可以说新增长理论只是讲增长本身,没有说明驱动经济增长的激励结构与真正动因。

关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约束分析,在古典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斯密认为,财富的增长主要是取决于由生产分工所带来的效率提高,而生产分工的深化要决定于市场容量的扩大,所以从深层看,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长。马克思则将经济增长问题置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上层建筑这一开放动态系统中进行辩证的分析。马克思既分析了社会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又唯物辩证与唯物历史地分析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与约束。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李斯特立足于德国国情,满怀爱国热情地探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财富增长的根源。他认为,制度不仅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一种决定其他生产力要素发展的生产力,可以说它是财富增长之源。他说: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而个人的智力、道德与勤奋这些生产力或个人财富是随着自由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成正比,历史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

不过,必须强调,古典经济学家尽管充分肯定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对经济增长和制度结构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作出具体分析。而脉承于古典经济学并将其庸俗化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放弃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制度成了既定的前提和外生变量,从而制度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中未打开的“黑箱”。与此相反,脉承于德国历史学派的制度经济学,虽然着重分析制度演进,但是没有将制度演进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研究,这就使得他们“分析的棚子是空荡荡的”。

针对新古典学派忽视制度结构研究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研究和经济增长研究相脱节的状况,20世纪60年代后以舒尔茨、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开始着手制度内生化和驱动经济增长的“激励结构”即制度结构研究,并结合经济史实,提出了制度内生化的经济增长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分析,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经济制度变迁的选择和组织制度的创新不过是为了增进经济福利和效率。诺斯和托马斯通过经济史实分析,得出结论: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这些经济增长原因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有效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产权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依据上述经济增长理论关于增长动力源的探索演进过程,我们可以得到现实启示:21世纪我国要实现高速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寻求适合知识经济特征的集约经济增长轨迹,开启收益递增动力源。为此,(1)要从强调促使经济增长的土地、劳动、实物资本等实体性生产力要素转化为知识、技术、人力资本、产品研发等软生产力要素;(2)积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开发、积累促使现代经济增长的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具有历史积累性的动态新资源;(3)深化改革开放,适应经济形势变化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构建有效的制度激励结构,降低交易费用,刺激经济活动主体创新技术、积累知识与资本,开发新产品并提高产品质量,充分释放制度绩效。

### 三、制度绩效的生命周期与递减规律 和我国新一轮体制创新的必要性

作为约束人们行为规则的制度,其基本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服务经济活动、创建激励机制与合作条件,其基本任务是为人类社会构造有效的组织结构模式和文化结构模式,为个人行为形成激励集,鼓励人们发明、创新和勤奋工作。无疑,制度功能的发挥和基本任务的实现,既可以提高经济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又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由此必然促使社会经济系统绩效的提高。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就是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取决于经济深层的制度结构——产品的所有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和其他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因此,要提高经济效率,从深层看,必须进行制度交易或制度变迁。依据布罗姆利的制度变迁模型,制度交易即对制度安排进行选择的经济行为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改变收入分配,重新配置经济机会,重新分配经济优势。可见,制度交易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系统的效率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制度绩效。制度绩效的关键在于制度交易与经济活动主体(人或组织)是否相互适应以及相互适应的程度。制度绩效实质上是“适应性效率”。

就人类理性选择来说,制度的生命在于它的效率。然而,制度的效率不是永恒不变的。由于任何社会都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制度,每一种制度均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由此决定任何一种制度的效率都是相对的,制度绩效本质上是一个历史动态的范畴。因此,制度是有生命周期的,制度的效率也是历史变动的。一般来说,任何内含绩效的制度,起初是生机勃勃的,它所释放的效率曲线为一条斜率为正的曲线,意味着制度边际报酬为正。此时,制度将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当这种制度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或制度效率曲线达到一定点之后,则制度效率曲线的斜率将为负,即意味着制度将会随着其生存时间的递增而出现效率递减或边际报酬递减。此时,制度的生命也将走向衰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绩效的生命周期和递减规律。

制度绩效之所以具有生命周期和递减规律,其主要理由在于:(1)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发展要求与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产生的矛盾运动,因此,制度的生命或绩效主要体现在是否适合生产力水平和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内在的革命变动性从本源上决定了制度绩效具有历史动态性和生命周期性。(2)制度是由人生产供给的,人的有限理性决定

了人所生产供给的制度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制度绩效要局限于人的理性边界之内,因此,任何初始有效的制度,均存在改进的余地和变迁的必要,所以制度绩效既是相对的也是动态的,随着人类社会生产供给有效制度能力的提高,任何起初有效的制度,其释放出来的效率均会随其生存时间的递增而呈现递减趋势。(3)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方面,它是由少数“广义企业家”或“两级行动集团”组织生产的,而由广大“员工”免费消费,由此必然会在制度的生产上产生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外部性,当这种外部性递增时,则支付制度生产的成本也将随之而递增,而制度的效率则必然会随之而递减;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制度的供给要满足这种动态的需求,就必须持续地进行制度的生产供给,由此致使某些制度产生剩余,在制度供给过剩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制度的“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由此制度绩效将出现递减趋势。(4)作为适应性效率的制度绩效,它的释放首先取决于制度需求者或制度消费者的接受和适应程度,而制度的消费过程也存在一个“边际效用”趋势,由此决定制度绩效必然也有一个递减趋势;其次,制度绩效的释放,它来自于制度和人或组织以及环境的相互适应,而从长期来看,人、组织和环境总是处于动态变动之中,如果制度没有相应地随之而改进,则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就会递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连续保持了二十几年的快速增长,1979—1999年,GDP年均增长9.6%。这一增长速度不仅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历史地看,也普遍高于日本、亚洲“四小龙”曾创下的高速增长纪录,创造中国这样的持续高速增长奇迹无疑是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得益于体制改革后所建立的具有激励效应的新制度绩效的充分释放。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所建立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既符合当时农村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又能够使农民享有土地长期使用权、经营权和相应的收益权,克服生产队集体经营制度下的“搭便车”和高昂监督费用问题,所以,农业生产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责任制的制度变迁,增长了劳动者努力的边际报酬,导致了劳动者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增加,由此使家庭责任制的制度绩效出现了明显的报酬递增,从而促使农业生产出现奇迹般的高速增长。林毅夫根据生产函数估计发现,1978—1984年间,农作物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大约有一半(46.89%)来自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受制度绩效的生命周期与递减规律的制约,任何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其边际上升区域都是有一定条件和界限的,最后均会出现递减趋势,从而要为新的制度所取代。例如,我国农村在1984年以后,虽然家庭承包责任制对于改变农村经济面貌仍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其制度绩效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这也是我国1984年后农业产出增长放慢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提出了把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9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的一个重点。其主要内容是:稳定和完善的家庭承包经营,完善承包合同,完善集体统一经营。双层经营责任制的实行,虽然稳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且在方向上意图引导农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但是,这种制度

只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边幅上”进行修理,其内核仍是家庭承包经营,而且在农村实践上基本上没有进行大的制度创新,所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绩效递减规律仍然在发挥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1993年以来的连续经济下滑,是与农村没有再进行重大制度创新,从而使家庭承包责任制绩效递减规律的连续发挥作用,致使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密切相关。在21世纪,如果考虑到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和市场经济对农业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要求水平的提高以及我国加入WTO后对农村经济的冲击,则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土地的生产经营已不能再局限于家庭范围内。因此,如何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创新农地经营制度,提高制度绩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确保全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农村制度创新相类似,在我国城市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也创建了系列制度。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初期的各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经济责任制;1986年后的以完善企业经营机制为特征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经营责任制和资产经营责任制;1992后的现代企业制度等等。应该说,国有企业改革中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实行,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步步深入。但是,这些制度同样也摆脱不了制度绩效的生命周期和递减规律的制约,并不能产生“一包就灵”、“一股就灵”的神话。

因此,如果体制障碍是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最主要瓶颈这一判断和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得以成立,则依据制度绩效的生命周期与递减规律的要求,显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支持我国21世纪高速增长,必须进行新一轮体制创新!

#### 四、20世纪末中国体制创新的特征与21世纪初中国体制创新的原则和相应的政策选择

20世纪末20余年的中国体制创新,其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其方向和主线就是市场化。20余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实质上也就是中国经济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在这一创造“中国奇迹”的改革历史进程中,中国所走的道路是一种渐进式或进化式的改革之路。它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增量性或外围性。即在继续维持传统国有经济按照原有的方式运转的同时,在它的周围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或新体制来寻找新的生长点,以此来支持整个经济的发展和逐步改革整个经济体制。(2)渐进性。即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非激进改革手段、方式与途径,逐步地完成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3)“帕累托改进”性。一般来说,改革必然要涉及人们利益关系的改变,即在一些人受益的同时必有另一些人受损,所以它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但是,在我国改革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初期),为了顺利地推行改革政策,实行了一种在保证某些人不受损(或让政府支付这些人受损的改革成本)同时,让多数人收益的“帕累托改进”式的体制改革,如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和城市的“价格双轨制”改革。(4)非均衡性。我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每项改革措施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实验基础上,由点到面,层层推广;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有差别化的改革,这样一来,必然使我国的改革程度、改革层面与改革

范围呈现出非均衡性特征。

现实和未来的变迁本质上是对历史的扬弃。21世纪中国的体制创新,一方面应以过去体制创新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保证体制创新的连续性与继承性;另一方面,应依据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与资源相对价格和经济机会出现的新变化,对过去体制创新的特征进行必要的扬弃和修正。具体地说,21世纪中国的体制创新,笔者认为应遵循如下原则:

### 1. 坚持市场化的体制创新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场化的体制创新无疑是其根本原因。宋德勇通过计量分析,认为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者的变化可以解释30%的增长率(三者的变化率可以解释64%的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量的80%,人均GNP变化的90%,由此,他得出结论: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从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的历史看,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以市场化的体制创新为基础,因为,国际化是市场化改革的直接结果和标志,工业化又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动力。既然市场化体制创新是确保中国过去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那么,可以推论:要保持我国的高速增长,则必须坚持市场化的体制创新。再者,尽管经过20余年的市场化体制创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业已取得显著的、实质性进展,总体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60%多,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市场既有巨大的潜力,又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并且市场制度尚未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太理想,因此,中国的市场化体制创新,不仅要持续较长的时间,而且其空间也是巨大的,所以,要推动我国经济再度持续高速发展。

### 2. 注重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激励与优化配置制度建设,促使“勇士资本家经营”向“知识资本家经营”转换

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全面落实跨世纪发展宏伟任务,我们就要加快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特别注意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以增强我国经济的发展后劲。特别要加强基础性、关键性的高新技术领域的创新,加速高技术产业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应用。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话,从战略高度为我国21世纪的全面发展和相应的制度创新提出了明确的方向。

在改革开放前2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是一种资源投资约束型的短缺经济;另一方面,改革的重心主要是集中在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社会主义国有制”之外进行。在此特殊的背景下,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勇士资本家”,凭借其对国家政策的超前把握和市场冒险的勇气,在“国有制”外的自由体制空间中,天马行空地冲锋经营,或借助外资,或借助“双轨制”下的“租金”,快速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发展壮大非国有经济,刺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可以说,在我国这个大变革的特殊时期,“勇士资本家”成了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主角,经济经营主要表现为“勇士经营”。但是,当时间矢量指向21世纪后,我国的经济环境已转化成市场效率约束性的过剩经济,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其重心已转向人力资本较多的“国有制内部”(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事业部门和政府部门),而且,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

创新成了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新资源因素。因此,21世纪初我国要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则必须通过新一轮的体制创新,盘活“体制内”的人力资本,引导“体制内”大量的配置于非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力资本转向配置于生产经营活动,并大量地培育“知识资本家”,促使我国经济活动状况由“勇士资本家经营”转向“知识资本家经营”。

要实现这种转化,笔者认为主要应做好四方面的制度建设:其一,必须依据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人力资本绝对私有的产权属性,强化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构建一套以知识财产为主体的劳动力产权制度,这是促成我国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知识资本经营的根本制度保证。其二,必须依据知识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规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变革传统分配方式,建立按知识要素分配制度,实现从“制度环境”上激励生产经营者努力进行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为资本。其三,必须依据人力资本既有天生“偷懒”动机又有天生发展潜力之特性,变革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企业内部设立人力资本间接定价的特别合伙契约制度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入股与期权激励制度,实现从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激励生产经营者努力提高人力资本开发、利用效率。最后,必须依据人力资本的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本质属性和作为高度专业化的信息载体及其处理主体的特征,建立人力资本所有者尤其是高级人力资本所有者“网络高速公路”制度,加快人才流转,优化人力资本的空间、产业配置。

### 3. 实现空间“非均衡体制创新”向“均衡体制创新”大转换,促使市场向西部拓展

由于前20余年我国实施的改革模式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非均衡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即是先在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改革试点,然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的“梯度推进”改革模式。这种改革模式不可避免地要在制度变迁上产生区域性的时滞,并且,由于制度变迁上的时滞又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我国东西部体制上的差距和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从体制上看,在所有制结构上,到1994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份额已降至小于33%,而西部地区则仍高达70%;在市场制度上,东部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位居前10位的有9个,而西部有6个市场化程度排在全国最后10位。从经济发展水平看,1978—1998年的20年间,沿海地区的GDP占全国的比重由52.37%上升至58.12%,而西部占全国的比重却由16.68%降低到13.96%。

诚然,为了降低改革风险与成本,顺利地推进改革进程,我们实行实验推广式的“非均衡体制创新”模式是很有必要的,与此同时,依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要求,在经济起飞时期,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也是很有必要的,实践证明,这种不平衡的改革模式和发展战略是富有成效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看到:(1)市场化的改革已为实践证明是具有绩效的正确的体制创新;(2)市场经济下市场本质上是统一开放的市场;(3)20多年实施的“非均衡的体制创新”模式和非均衡的梯次发展战略,客观上已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统一市场的形成,东西部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因此,在21世纪,为了确保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实现我国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任务,就必须从战略高度,大胆地实现经济体制创新模式由“非均衡体制创新”向“均衡体制创新”转换,与此同时,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换。

为了实现这两个转换,我们认为实施“市场西进”的改革战略,促使体制向西部拓展和深化,为此:(1)必须利用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和经济结构大调整的国际经济发展这三大趋势和西部亚欧大陆桥的区位优势,加快西部的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由此加快西部市场的发展。(2)嫁接东部市场化改革经验,加大西部改革力度,鼓励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地方政府和企业家进行市场化制度创新,突破制度供给的“瓶颈”。(3)加快西部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产权改革,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创新银行金融制度,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降低国有和非国有经济比重,积极培育多元市场竞争主体。(4)积极培育和发展证券融资、风险投资等资本市场和现代化的人力资本市场,加速西部地区市场体系的建成和完善。(5)由于市场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的集合,从里到外包含了交易制度、政治法律权威制度以及伦理道德规范制度,所以我们在将市场向西拓展时,必须克服将市场简单等同价格、供求、竞争机制的片面观念,要注意市场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的有序运行。(6)要通过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相互配合来建立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力克服市场失灵,并运用一定的政策倾斜,支持西部的大开发和市场化改革。

#### 4. 着力于“体制内”制度创新,促使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体制的配套改革和全面创新

我国前20余年的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如此,我们还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放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外”,即主要是在国有制经济之外进行改革。虽然这种“体制外”的改革,基本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由此使改革受到的阻力小,成本低,进展顺。但是,必须看到,“体制外”改革并不是不要“体制内”改革,它只是将改革的难点或改革的“攻坚战”推迟了而已。综观历史,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一个系统动态的过程,对此,马克思作了精辟的表述,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诺斯也认为,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应是产权理论、国家(或政治)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整体。因此,系统改革观要求我们不能单条腿地进行“体制外”改革,必须在“体制外”改革达到一定程度时,将改革的重点转向“体制内”,并且要在政治、科教、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与经济基础相应的配套改革,以推动社会经济体制的全面革新。

在21世纪初,为了实现体制创新重点的转换,我们认为,(1)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除了依据有进有退的原则,完成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打好国有企业这场“攻坚”战役外,还必须加快前20余年改革滞后的银行与投融资体制改革。要适当设立与发展非国有银行,支持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非国有企业

和民间中小企业发展,并提高我国有限资金的利用率;要大力发展证券交易所,促进企业产权流动,优化资源配置;要积极创设风险投资基金,鼓励科技创新,大力支持科技企业发展。(2)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依据大社会小政府原则,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效、精简、廉洁的公务员队伍,与此同时,必须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民主法制,完善民主监督,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3)在科教体制改革方面,首先应依据科技与经济相互推进原则,通过科研机构市场化、科研经费来源市场化和科研过程与成果市场化的改革方式和途径,构建符合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要求的市场化科技体制,逐步建立、完善科技成果在市场交换中的法律保护制度和有序转让制度。其次,要通过树立教育是重要的知识生产力、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和“协同”因素,是社会公共事业和事关全局的知识产业,是培养和提高国民创新能力和素质的基础等现代教育新观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变“黑板知识教育”为经济建设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教育”,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终身教育工程”,努力完成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教育模式大转换。最后,应在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创办“学习性企业”,既加快科研成果转换为现实生产力又可以加快实施事业单位的“减员增效”改革。(4)在文化制度创新方面,必须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营造先进、健康的文化氛围和土壤,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创新,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因为这是我国先进文化的核心;其次,必须大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反对迷信,消除愚昧;再次,必须吸取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积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 参考文献:

1. 朱勇、徐广军:《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2. P. M., Romer.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5, pt.2, pp. s71~ s102.
3. Lucas, R. E. J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22, pp.783 ~ 792.
4. G. M., Grossman and E. Helpman 1991.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MIT press.
5. 周小亮:《集约型经济增长探源》,载《当代财经》,1996(10)。
6. 王开国、宗兆昌:《论人力资本性质与特征的理论渊源极其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6)。
7. 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8. 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9.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0. 李怀:《制度生命周期与制度效率递减》,载《管理世界》,1999(3)。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 福州 350002)

(责任编辑:曾国安)